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丛书主编 / 郭贵春

语言、意向与存在

杜建国 ● 著

 科学出版社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丛书主编 / 郭贵春

语言、意向与存在

杜建国◎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意向与存在 / 杜建国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4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978-7-03-043648-1

I. ①语… II. ①杜… III. ①分析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5648 号

丛书策划: 孔国平

责任编辑: 邹 聪 王茜艳 / 责任校对: 朱光兰

责任印制: 赵 博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陈 敬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字数: 256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境论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中心”基金资助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编委会

主 编 郭贵春

副主编 殷 杰

编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凡 费多益 高 策 桂起权 韩东晖

江 怡 李 红 刘大椿 刘晓力 卢 风

乔瑞金 任定成 魏屹东 吴彤 肖显静

薛勇民 张培富 赵万里

总 序

怎样认识、理解和分析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是我们把握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推进它在可能发展趋势上获得进步的重大课题，有必要将其澄清。

如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了一部书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书中有作者明确地讲：“科学哲学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在整体的文化范围内，科学哲学现时甚至不是最宽广地反映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其他科学研究的分支，诸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争论的对象。那么，也许这导源于那种不景气的前景，即某些科学哲学家正在向外探求新的论题、方法、工具和技巧，并且探求那些在哲学中关爱科学的历史人物。”^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视角上地位的衰落。而且关键的是，科学哲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探求现实的科学哲学的出路，都被看做是一种不景气的、无奈的表现。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哲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的研究范式。因为，一个学科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纲领；而没有了范式和纲领，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科，同时能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位就必然地要降低。因而，努力地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发展科学哲学，在这个范式的基底上去重建科学哲学的大厦，去总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就是相当重要的了。

换句话说，当今科学哲学是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非突破”的时期，即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欧洲大陆哲学与大西洋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常规科学的进展与一般哲学解释之间的碰撞与分析。这是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必然地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从20世纪的后历史主义出现以来，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第二，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无论是什么样的知

^① Gary L. Hardcastle, Alan W. Richardson, ed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XVIII. Logical Empiricism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6

识背景出身的科学哲学家，对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把握本质的困难，它所要求的背景训练和知识储备都愈加严苛。第三，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它局限的一面，需要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汲取和借鉴更多的方法论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忽略的一面，轻视了它所具有的本质的内在功能，需要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发扬光大。第四，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综合各种流派、各种传统去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任一种单纯思维趋势的片面性，但是这确是一条极易走向“泛文化主义”的路子，从而易于将科学哲学引向歧途。第五，由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淡化及研究纲领的游移，导致了科学哲学主题的边缘化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试图用从各种视角对科学哲学的解读来取代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或者说把这种解读误认为是对科学哲学的主题研究，从而造成了对科学哲学主题的消解。

然而，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它的科学方法论的内核不能变。这就是：第一，科学理性不能被消解，科学哲学应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第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能被消解，它从来就是科学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三，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及其语境论的基础不能被消解，因为它是统一科学哲学各种流派及其传统方法论的基底；第四，科学的主题不能被消解，不能用社会的、知识论的、心理的东西取代科学的提问方式，否则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弘扬科学理性就不叫“科学哲学”，既然是“科学哲学”就必须弘扬科学理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理性与非理性、形式与非形式、规范与非规范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统一。我们所要避免的只是“泛文化主义”的暗流，而且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泛文化主义”，都不可能指向科学哲学的“正途”。这就是说，科学哲学的发展不是要不要科学理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弘扬科学理性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弘扬的问题。中国当下人文主义的盛行与泛扬，并不证明科学理性的不重要，而是在科学发展的水平上，由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激发了人们更期望从现实的矛盾中，通过人文主义的解读，去探求新的解释。但反过来讲，越是如此，科学理性的核心价值地位就越显得重要。人文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理性作基础，那就会走向它关怀的反面。这种教训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很多的，比如有人在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时，曾以“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为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人本主义肯定是对的，但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就必然地走向它的反面。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并不存在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文理性拓展和延伸了科学理性的边界。但是人文理性不等同于人文主义，这正像科学理性不等同于科学主义一样。坚持科学理性反对科学主义，坚持人文理性反对人文主义，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要坚守的目标。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存在的某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论与20世纪后半叶历史主义的多元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主义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去诉求科学理论进步纲领的多元性;而现今的多元论,是站在文化分析的立场上,去诉求对科学发展的文化解释。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扩张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但它却存在着文化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消解科学理性的倾向性。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混为一谈。这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技术哲学自身本质地赋有着更多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以单纯科学理性的要求为基底的。

在世纪之交的后历史主义的环境中,人们在不断地反思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和历程。一方面,人们重新解读过去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以适应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重新解读,找出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尤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走向。有的科学哲学家在反思20世纪的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即“广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存在着五个“引导性难题”(leading problems):

第一,什么是逻辑的本质和逻辑真理的本质?

第二,什么是数学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数学命题的本质、数学猜想的本质和数学证明的本质?

第三,什么是形式体系的本质?什么是形式体系与希尔伯特称之为“理解活动”(the activity of understanding)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第四,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意义、指称和真理的本质?

第五,什么是理解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感觉、心理状态及心理过程的本质?^①

这五个“引导性难题”概括了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探索所要求解的对象及21世纪自然要面对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讲,在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中,理论模型与实验测量、模型解释与案例说明、科学证明与语言分析等,它们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整体,或者说整体性的科学方法论,整体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以,从广义的科学哲学来讲,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是联结在一起的。同样,在21世纪的科学哲学进程中,这几个方面也必然会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只是各自的研究层面和角度会不同而已。所以,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都是整个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在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中是统一的和一致的。这种统一和一致恰恰是科学理性的统一和一致。必须看到,认知科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科学理性的一致性的捍卫,而不是

① S. G. Shauk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gic and Mathematics in 20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讲,20世纪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探索,是一个从自然到必然的过程;它们之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是一个由不自觉地自觉的过程。而21世纪,则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统一的动力学的发展过程。

那么,通过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反思,当代科学哲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最大的“引导性难题”又是什么?

第一,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要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范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没有明确逻辑起点的学科肯定是不完备的。

第二,构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彼此可以真正地相互交流和共同促进,从而使它成为科学哲学生长的舞台。

第三,探索各种科学方法论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新基底。在这个基底上,获得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有效统一,从而锻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理论与发展方向。

第四,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要持续地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一点,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关键的东西。同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谈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去谈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论、科学史学及科学文化哲学等流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否则的话,一个被消解了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

总之,这四个从宏观上提出的“引导性难题”既包容了20世纪的五个“引导性难题”,同时也表明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就在于: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进步越来越多元化。现在的科学哲学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这些多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愈加本质地相互渗透、吸收与融合。所以,多元化和整体性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将在这两个方面的交错和叠加中,寻找自己全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哲学拥有它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三大转向”的科学哲学,而今走向语境论的研究趋向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必然取向之一。

我们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学科,这些年来就是围绕着这四个面向21世纪的“引导性难题”,试图在语境的基底上从科学哲学的元理论、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探索科学哲学发展的路径。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

郭贵春

2007年6月1日

前言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包含两个传统：一个是分析哲学的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塔斯基、蒯因、达米特、克里普克等；另一个是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但大多数人把语言哲学狭义地理解为分析哲学的传统。实际上，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尽管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都是研究语言，但语言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指称、意义、真和言语行为理论。而分析哲学尽管也研究语言哲学，但它是通过对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的分析来研究语言的。可以说，分析哲学是体现在某一方法上的语言哲学。本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属于分析哲学传统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和吸收欧洲语言哲学的思想成果。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同语言哲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像弗莱斯达尔在他的《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是完全可能的^①。有鉴于此，本书在研究分析哲学传统的问题时，也涉及现象学、诠释学及修辞学传统的内容，如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理论、诠释学的文本诠释理论和修辞理论，以及存在哲学的语言理论等。目的是通过对语言的意向及语境分析，把握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如何与世界相关联的问题。

分析哲学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可以归功于弗雷格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通过对数学基础的研究，发明了现代符号逻辑学，引发并建立起来一种博大精深的语言分析哲学。如果我们把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的起点，那么毫无疑问，无论是弗雷格、皮尔士、摩尔还是罗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语言转向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是维特根斯坦，他在 1922 年的《逻辑哲学论》中所阐发的思想成为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思想指南。

弗雷格和胡塞尔分别引领了 20 世纪的两个志趣迥异的哲学运动。前者是分析哲学之父，而后者是现象学学派的主要创立者。最初他们是两个方向异常接近的思想家，尽管存在着一些兴趣上的差异。那究竟是什么细小的成分和因素使差异最终扩张，产生出如此巨大的结果呢？^② 达米特认为，要解释这一原因，答案肯定是相当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出分析，即如果我们把语言转向

① [美] 弗莱斯达尔. 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 [J]. 郁振华译. 哲学译丛, 1998 (2). 1

② [美] 弗莱斯达尔. 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 [J]. 郁振华译. 哲学译丛, 1998 (2). 6

看作是分析哲学的规定特征的话，那么使分析哲学能够容易接受而现象学却无法接受的东西，一定会成为我们理解最初不分畛域的两种哲学流派最后分道扬镳的重要依据。

早在1900年，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二卷就系统地提出了“涵义”与“意向对象”的思想，并做了深入的研究。1907年以后，为了发展意向对象的思想，他推广了涵义或意义的概念^①。在涵义和对象上，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和弗雷格一样，胡塞尔也认为涵义是对象的给予方式^②，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涵义。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所强调的是对象在“体验”中的给予方式。^③ 由于对体验的关注，胡塞尔更重视意向活动的本质，即质料与质性的统一。^④ 尽管他在弗雷格的影响下也拒斥心理主义，但在分析意向活动的过程中，他所坚持的是一种内在的客观性。他认为，要使现象学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就是要把对象建立在一种内在的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而外部世界作为超越的对象是需要现象学的还原而被悬置起来的。与胡塞尔不同的是，弗雷格所关注的是指称对象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方式，在他看来，指称对象的显现方式是涵义，而语句的涵义就是思想。思想不是关于心灵和意识的内容，也不依赖于语言而存在，它是一种客观的东西，但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弗雷格强调：必须把语词的意义和与此相关的观念区别开来，把被判断的内容和判断活动本身区别开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客观的，体现了世界的逻辑关系。因此，语言转向一旦发生，“分析思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语言分析”这一分析哲学的根本信条就被确立下来。接受这一信条使得人们把思想哲学与语言哲学等同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分析哲学就成熟了。

当然，对分析哲学的研究主题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塞尔认为，分析哲学主要关心的是意义分析。^⑤ 而与其他学派所不同的是，他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一种对思想的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以及美国以蒯因和戴维森（D. H. Davidson）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之间的区别很大，但基本上都坚持这些准则。^⑥ 根据上述思想，逻辑实证主义

① [美] 弗莱斯特达尔：《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J]，郁振华译，哲学译丛，1998（2）：7-8

②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M]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7

③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M]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0-54

④ [美] 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胡塞尔》[M]，杨富斌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40

⑤ 宾宁：《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

⑥ [美]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M]，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

运动有一个基本假设：一切有意义的命题不是分析的就是经验的，而综合命题在经验上是可证的，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就是其证实的方法。

另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心灵哲学有了很大发展，其标志是布伦塔诺的描述性心理学、冯特和威廉·詹姆斯等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哲学、马赫的“身心平行原理”，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等理论的建立。20世纪20~40年代，由于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心灵哲学走入低谷。因为在行为主义看来，传统心灵主义所说的心理、意识之类的东西是无法被客观地观察到的，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而以上述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心灵哲学也自然受到人们的拒斥，被归入到形而上学。40年代以后，随着意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的逐渐衰微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蓬勃兴起，以前不能直接予以客观观察的内部心理过程及状态重新进入到科学和哲学研究的视野中。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研究》《片断》和《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的写作和出版，表示心理现象的语词和概念引起了分析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从而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背景下，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和特征的心灵哲学迅速崛起，并成为当代心灵哲学发展的主要流派。从此，西方心灵哲学走出低谷，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物理主义的发展，科学实在论的兴起，特别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的异军突起，一种新的以自然科学前沿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来解释和分析各种心理现象的科学主义的心灵哲学应运而生。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蒯因、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对传统的分析哲学的怀疑和批判，在心灵哲学中对语言分析的心灵哲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清算，如揭露语言分析方法在心灵哲学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强调有关科学理论在解决心灵哲学问题中的基础作用。而从六七十年代至今，英美语言哲学中的意向性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本模型的基础上：一是以福多（J. A. Fodor）和德瑞斯基（F. Dretske）为代表的因果论的心理语义学模型；二是以蒯因、奥斯丁、格赖斯、丹尼特（D. Dennett）、塞尔、戴维森为代表的言语行为模型。前者主张对心理意向性进行因果论的解释，把人的心灵与世界之间的意向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后者则通过对人类的言语行为的结构，以及它的意义性条件和真理性条件的研究去揭示人类意向性的结构和特征，从而对分析哲学的指称、意义、真及知识论做出新的说明。

总之，随着语言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围绕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逐渐从“心灵”与“世界”走向“心灵”与“世界”之间，即走向它们的关联上来。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意向性的，那么，我们在研究语言和意向性的关系及语义的生成时就必然会涉及语境。语境理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却又很难把握的理论，是对语义生成和使用产生影响的诸要素的总和。有了意向就会产生语境，但

究竟什么要素能对语义发生作用，只有到语义最终形成才能确定。人们对语境思想颇多非议，主要是由于许多人对这一理论不甚了解或使用不当所致。语境(context)最初源于con-text，也就是把文本相连接，是从前后文的关联上来理解语义。后来经过延伸，发展为语言构造，以及理解语言延伸和决定其意义可能性的条件。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围绕文本（会话或书面）而建立起来的诸要素的集合。但有些人把它理解为境况(condition, circumstances)或环境(environment)，因此主张可以把它译为“予境”或“与境”。在使用和理解方面，把语境分析简单地看作是一般性的环境相关性的分析，而没有把握文本意义(语义)的生成和使用这个中心环节，这样势必会把语境分析等同于一种想当然的系统结构方法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对语境理论的误解和滥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弗雷格早在《算术哲学》一书中就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语境思想。较早对语境概念进行探讨的是派普尔(Stephen Pepper)，他于1942年在《世界假说》(*World Hypotheses*)一书中提出，人们所建构的哲学可以划分为四种世界观，其中每一种世界观都有自己的“根隐喻”，它包括：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他称语境论的世界观主要来源于詹姆斯实用主义的看法，以及部分来自皮尔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①但此后，语境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随着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哲学的解释学转向(hermeneutic 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 turn)，语境理论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是由于在文本诠释和语言修辞的过程中，语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每一个文本都是在一定语境中形成的，都渗透了语境的影响。在解读文本时，由于人的意向、语境不同，对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诠释学作为一门意义说明和解释的艺术，目的是要通过不同语境下的诠释者的说明和解释实现“视域融合”，最终揭示出文本的多重意义。而修辞学则是为了不同语境下的诠释交流，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劝导的艺术。它是通过发明理由、说服论证最终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随着诠释学和修辞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语境的研究也逐渐重视起来。黑尔(Thomas E. Hill)于1971年发表的《意义概念》(*The Concept of Meaning*) (2002)、利兹伯格(Michiel Leezenberg)的《隐喻的语境》(*Contexts of Metaphor*) (1995)、林奇(Michael P. Lynch)的《语境中的真》(*Truth in Context: An Essay on Pluralism and Objectivity*) (1998)、罗伊·迪雷(Roy Dille)主编的《语境问题》(*The Problem of Context*) (1999)、普利叶(Gerhard Preyer)和彼特(Georg Peter)主编的《哲学中的语境论》(*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2005)、吉尼(Dimitri Ginev)的《构造的

^① Capaldi E J, Proctor R W. Contextualism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39

语境》(*The Context of Constitution*) (2006), 以及斯托依普 (Matthias Steup) 和索萨 (Ernest Sosa) 主编的《当代认识论的争论》(*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2006) 等著作都是近年来国外哲学界对语境思想的比较系统的论述。就国外的研究状况来看, 语境理论正在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当然, 在语境研究过程中, 什么能够成为语境的要素, 以及语境在语言意义和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也使得许多人对语境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持谨慎的态度。^①郭贵春教授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对意向性、语境论与分析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为从意向和语境的角度研究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②这使我受到启发, 得以从语言、意向与语境的关系上来审视 20 世纪分析哲学的发展。

研究语言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后分析哲学的意向转向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概括说来, 20 世纪对于意向性的研究是按照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哲学; 另一条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及塞尔为代表的英美语言意向哲学。本书是通过解读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的意向性理论开始的。但是, 通过解读和比较, 本书选取了第一条思路。这是因为, 尽管许多英美哲学家都对语言和意向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对语言和意向之间的联系给予了许多合理的说明^③, 但是, 总的来看, 他们大多数人只是关注命题态度和心理表征。所谓“命题态度”, 主要是指我们“心智”的内容, 即我们的思想、信念、判断的

① 柏林理工大学的汉斯·波塞尔教授, 以及德国哲学家、凯瑟斯劳滕大学的沃尔夫冈·诺伊萨教授对语境论所表达的看法反映了学者们既认为语境论是一个哲学分析的很有希望的视角, 同时也对语境论的发展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也说明语境分析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是有效的, 人们还不太有把握。见郭贵春: 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 哲学动态 [J], 2005 (1); 郭贵春, 成素梅: 德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与现状——访汉斯·波塞尔教授和李文潮教授. 哲学动态 [J], 2006. 11

② 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 [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论语境 [J]. 哲学研究, 1997 (4); 福多的意向实论 [J]. 哲学研究, 1995 (8); 后现代科学哲学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当代语义学及其本质特征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6); 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2); 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 哲学动态 [J], 2005 (1)

③ 如, Quine W V. “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1976); Fodor J A and Katz J.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1964); Fodor J A. 《The Language of Thought》(1975)、《Propositional Attitudes》(1978)、《Representations》(1981)、《Psychosemantics》(1987); Grice H P. 《Meaning》(1957) “Method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75); Dretske F I.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1981)、《Mind over Machine》(1986)、《Explaining Behavior: Reasons in a World of Causes》(1988); Dennett D. 《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1969)、《The Intentional Stance》(1987)、“Review of Psychosemantics” (1988); Searle J R. 《Intentionality》(1983)、《Minds, Brains and Science》(1984)、《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1997)、《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1998)、《Mind and Reality》(1999)、《Rationality in Action》(2001) 等, 都对意向性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内容。由于这种表达是命题式的，具有真假，我们把这类心理现象叫作“命题态度”，而这种对内心的表达，被称为“心理表征”。在对上述“命题态度”和“心理表征”进行分析时，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意向性，但略显不足的是，这种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命题表达的“态度”上，也就是说，所关注的只是命题表达中意向词分析。它通常由特定的态度（期望、信念、思想等）和“that”从句所表达的命题构成，而忽视了其他语言生成和使用过程中的意向性。实际上，无论是使用语言的过程还是生成（或构造）语言的过程都具有意向性，意向性不仅存在于意向词中，同样存在于不含有意向词的语句中，特别是构成判断句的谓述结构中，语言的意向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意向性就是意识指向某物的性质，这种指向性表现在人的各种感官知觉和理性直观对意向对象的把握。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侧显”（adumbration）。侧显概念是意向性的一个本质特征，它凸现出人的意向构造“对象”的过程和机制。没有侧显就没有感性和理性，以及不同感官之间的区分，最终也就没有认识。从语言角度来说，没有侧显就没有谓述结构语句。我们通过“这是红色的”“这是方形的”“这是木质的”来描述我们眼前的一张桌子。在意向方面，我们也是通过把我们的“意向目光”集中在“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材料”的显现上，从而构造出一个“红色的”“方形的”“木质的”桌子。作为每一次的构造活动所形成的“意向对象”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对象的“显现内容”。所有范畴活动都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形成判断的基本逻辑形式“S是P”。但在意向对象中，“S是P”并不单独存在，“作为一个意向对象核心的同一个‘S是P’，可以是一种确定的内容，一种可能的相信，一种猜测性的相信，如此等等”^①。也就是说，在某一意向对象为核心的意向活动中具有相应的层级结构，每一意向对象的层次都有其层次特征^②，如信念、情绪和意志特征，但它们都是以谓述判断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范畴活动所产生的判断或谓述语句，我们就不会有像“相信”“希望”“等待”“记得”等意向活动所意向的内容。当我说“我相信天要下雨”时，我不是相信“天要下雨”这个句子的涵义，而是相信这个在某一时空中即将发生的事情——“天要下雨”。所以，在“天要下雨”这个谓述语句中，已经有了我们的意向性。因为，正是我们的意向目光注视到天空上的乌云，以及其他下雨前的征兆后，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出“我相信天要下雨”这个复杂语句。当我说“我相信天要下雨”时，“我相信”这一意向活动并不是游离于“天要下雨”之外的，而是直接参与到“天要下雨”这一考察中，因此，在“天要下雨”这个谓述句中必然

①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39-240

②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54-255

包含着人的意向。但英美哲学家和国内大多数的研究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书沿着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分析的思路,选择从谓述语句入手来分析语言的意向性。

在确定了范畴直观和谓述语句之间关系的研究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语言是意向构造的,从谓述结构层次上说,由什么语词作为一个体现意向作用的语词来实现这种意向构造活动呢?因为我们的意向活动在构造意向对象时,总要有表达意向活动的语词。从谓述语句的基本结构“S是P”来看,主语“S”表示某一“意向对象”,而“P”是显现内容,被人们称为“系词”的“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显然,如果我们把“S是P”看作是一个具有意向性的语句,那么,这个作为“系词”的“是”恰恰把“意向对象”和“侧显内容”连接了起来。本书延续了被中外学者所普遍忽视的海德格尔“是”与“存在”关系的探讨,并把它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相对照,从而找到了一个语言分析的崭新视角,即在谓述语句“S是P”中,“是”所具有的意向构造作用。^②在找到具有意向作用的语词后,我们就可以分析范畴直观的基本逻辑形式“S是P”的语言构造作用了,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隐喻的基本结构“S是P”。在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所具有的意向构造作用。

在我们意向目光指向意向对象时,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意向对象”和“对象本身”之间的关系问题。意向对象是意向构造的结果,它并不是对象本身。意向的每一次构造活动只是构造了“对象本身”的某一方面,因此,意向研究就要分析对象的给予方式。在这一问题上,胡塞尔和弗雷格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把对象看作是“给予的”,看作是对象显现给我们的。但是,弗雷格认为在对象的显现中,并没有意向构造的作用,或者说他并未明确地加以研究。因为他把思想看作是可以脱离意向和语言而存在的东西。而胡塞尔所强调的是通过人的意

① 他们认为,一个人“相信 $2+2$ 是 4 ”与“ $2+2$ 是 4 ”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相信“ 4 是 4 ”,但可能不相信“ $2+2$ 是 4 ”。而实际上,这正好说明“相信”这类意向活动不是一种空泛的活动游离在“谓述语句”之外,而是参与其中。每一个具有类似于“相信”这样的意向词的判断都与从句中的“谓述语句”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以“谓述结构”为核心的意向层级结构

② “是”在语言中是否具有意向构造的作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必须要深入到语言实践中去考察。实际上,“是”这个词本身在句子中的作用就是很奇特的,并且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关于它就产生了很多争论,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主要就是围绕着“是”在语言中的作用以及“是”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的。当然,这种探讨一直延续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中。而亚里士多德只是从逻辑的角度把“是”作为一个“系词”来看待,但并没有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看到在后来康德对“存在”一词的追问、罗素关于摹状词理论的探讨以及蒯因的“本体论的承诺”中,都有“是”这个“幽灵”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对“是”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在本书第二章以及后面的部分中进行。可参见:“康德的存在论题”,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下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80-885

向构造，对象在意识中给予我们的。在这里，获得一个对象的涵义在弗雷格看来是通过对象的显现方式来实现的，而在胡塞尔那里则是通过涵义（或意义）意向和涵义（或意义）充实来完成的。涵义意向是意向指向“意向之物”，涵义充实则是通过范畴直观的形式予以完成的。在涵义意向中，意向指向某一语境的“指称点”（reference point），涵义充实是围绕着语境中的“指称点”来完成的。脱离了语境，涵义充实过程就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结的过程。涵义意向设定了任何一个意义的构造都具有一个意向，都指向某一“侧显”（指称点），这样也就暗含了语境的要素。

在对语言的意向和语境思想做了一番探讨之后，我们对传统分析哲学所关心的“指称”“意义”和“真”的问题就可以逐一地进行梳理。在指称问题上，本书澄清了人们经常混淆的指称（reference）和指称对象（referent）之间的关系。指称是一种关系，它与语言相联系；而指称对象则与外部世界相关联。当然，指称对象在弗雷格看来就是“对象本身”，而在胡塞尔那里，它是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的意向构造对象。这样一来，涵义被看作是指称对象的显现方式，而意义（meaning）理论包含了涵义（sense）理论和指称理论。在弗雷格的理论中，意义和涵义有着明确的划分，而在胡塞尔那里，这两个词会经常混用。弗雷格认为涵义和指称对象是不同的，它只是对象的显现方式，所以，相同的对象可以有着不同的涵义。他以“启明星”和“暮星”同是“金星”为例来说明对象和涵义的关系。当然，最初弗雷格在意义和指称对象之间也是不加区分的^①，他用德语词“bedeutung”来表示指称对象。在他看来，涵义通过语词来表达，但语词的涵义只有在语境的联系中才能确定下来，一个句子可以有涵义而没有指称对象。涵义（sinn）在德语中多用在语词的意思方面，而弗雷格使用的“bedeutung”（用作指称对象）表示有重大意义、深远意义的涵义。弗雷格用“bedeutung”一词表示指称对象，是否因为它比“sinn”更基本呢？无论怎样，澄清意义和涵义是有必要的。这样，在对一个语句的意义进行判断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知道，它是有涵义的还是无涵义的，以及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并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它的意义。例如，如果在我眼前存在着一朵玫瑰，当我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时，那么上面的句子就是有涵义的（从涵义是指称对象的显现方式这一角度来理解）。当然，这一句子（涵义）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无论真与假，它都是有涵义的。但如果我眼前根本就没有玫瑰，那么，“这朵玫瑰花是红的”就是没有意义的。而当我们混淆了意义和涵义的使用时，就会造成混乱。

① 王路：《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9。